

丝路
SILU XUNZONG
寻踪

商 赶大营

方兆麟◎著



尽现“三千货郎满天山”波澜画卷
揭秘津帮商人“赶大营”尘封历史

从渤海之滨到天山大漠，从随军商贩到商界翘楚，他们用勤劳和血汗创造出中国近代商贸史的奇迹，为开发建设西北边疆、巩固民族团结写下了华彩篇章。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

序一

马大正*

2016年3月初，天津电视台王煜铭先生和天津市政协方兆麟先生不辞辛劳，专程赶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来拜访我。我们就电视纪录片《赶大营》筹拍中涉及近现代新疆历史诸问题进行了愉快交谈。其间，兆麟先生惠赠48万余字的《丝路津商——赶大营资料汇编》一书。时过一年有余，2017年7月，兆麟先生又将其这部大著书稿送我，并嘱为序。

我与兆麟先生虽是初识，但面对作者的真诚和执着，加之我个人长期研究新疆已形成的“新疆情结”，实在不忍推辞。今年8月以来，忙里偷闲，在几次出差的航班上览阅了书稿。国庆长假几天又通读了一遍，还翻阅《丝路津商——赶大营资料汇编》一书，颇有感悟，写下如次认识与读者分享。

一、选题新，贴近现实

所以称之为新，历史上津商远赴新疆经商，始自左宗棠远征新疆时“赶大营”，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这段中原与新疆关系史上轰轰烈烈的一个侧面长期被湮埋在历史尘埃中，鲜有专门研究著作问世。本书可

*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谓是此类题材学术专著之第一部，具有填补研究空白之效。

所谓贴近现实，作者的研究是在丝绸之路历史大视野下展开的，视野宽、视点高，依托历史、面对现实，在“一带一路”倡议有序推进的大背景下，重温近代以来津帮商人进疆的艰辛、业绩的骄人，实有不忘前人、启迪今人的以史为鉴之效！

二、资料扎实

研究者深知，资料是研究得以展开并深化的基础。本书作者穷己之力，广泛收集相关资料，既有档案文献，也有当事人或当时人的亲历记述，以及今人的大量口述史料。更可贵的是作者历年的田野调查、实地考察积累的丰富、多彩、宝贵的资料。面对丰富的资料，作者不是有文必录，“照单全收”，而是重比较、清爬梳，尽力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由此给后来研究者两点启示：一是，资料的广泛性是研究成功的基础；二是，田野调查是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功，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义之真谛也即在此。

三、立论公允，考订有素

全书谋篇布局合理，对“赶大营”的由来、发展、作用等叙事清晰、分析透彻、立论公允，从国家治疆的高度、促进中原与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广度，肯定了赶大营的历史功绩和津帮商人的开拓精神。

作者对于一些历史细节的考订也颇见功力，如对似乎已成定论的当年黑喇嘛城堡照片真伪，作者通过实地勘察，加之自己有过八年内蒙古草原插队和三年测绘工作经历，认为这张照片“不是黑喇嘛城堡！”并由此作者抒发感言：“历史的印迹随着时光的流逝，在一点点被磨平，对于搞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还原历史真相是一个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凭联想、推测去还原历史，很有可能会将真实的历史引向歧途。所有搞历史研究的都知道，完全真实地还原历史几乎是难以做到的，但通过不断的努力让事实更加贴近历史真实，是每个从事历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和责任。”

对此言，愚以为：诚是矣！

四、治学严谨，厚积薄发

作者长期从事地方文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对于“赶大营”并由此拓展至津帮商人进疆经商的历史，由感兴趣者到关注者，再到研究者，其间经历了20余年时光演进，直至本书的撰写、出版，用治学严谨、厚积薄发来概括，实不为过。即以作者为此研究之题所进行的田野调查言，持续近10年，足迹遍内蒙古、甘肃、新疆，访问众多津帮商人后裔，收集大量口述史料，弥补了史载文字之不足。此乃治学之道，实为难能可贵。

总之，本书达到了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本书以赶大营历史为主线，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对中国大西北进行了历史穿越。”读者从中获取了知识，受到了启迪。这是一部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兼具的研究之作，也是一部不同层面读者皆宜一读的好书！

是为序！

2017年10月8日

于北京自乐斋

序二

刘庆柱*

我和方兆麟先生是同乡，又是同事与同行。“同乡”是因为我们都是喝着“海河水”长大的；所谓“同事”，就是他长期担任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领导，我又曾经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我们从事的都是“文史”社会工作，因此而联系较多，我经常得到他的帮助，他成了我与天津市政协朋友们来往的桥梁；所谓“同行”，我们都是搞历史研究的，我的专业是考古学，而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应该是历史学的“两翼”。

新世纪以来的“丝绸之路”国际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我曾经参加了一些相关活动。2014年5月，“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申遗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我应邀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堂”举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为部长们做了题为“丝绸之路的考古学解读”演讲。后来，天津电视台拍摄大型专题电视纪录片《赶大营》，这是近代丝绸之路的内容。2016年秋季，方兆麟先生与天津电视台的同志因为知道我这几年关注丝绸之路研究，找我谈《赶大营》的电视片制作、拍摄工作。方兆麟又谈及他正在撰写的《丝路寻踪——津商赶大

*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德国考古研究院外籍院士。

营》这部大作，约我撰写“序言”。

“赶大营”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天津与古代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地区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什么是“赶大营”？我从方兆麟收集的资料中得知，80多年前日本人奥村荣、山本斌在他们的《关于杨柳青商人在新疆的活动》调查报告前言中曾记载：当年一批以天津杨柳青商人，从遥远的天津到新疆经商，他们的“马车上装满远征军专用物品，追随行走在大路上的军队开始做生意，通常所说‘赶大营’即由此而来”。^①“赶大营”的“大营”即当时清王朝中央政府在新疆的驻军军营，这支军队就是左宗棠、刘锦棠在新疆统率的清军，他们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保障内地与西北边疆2000多年来的“丝绸之路”畅通而战斗在那里。而与之“军行则行、军住则住”的“同生共死”的津帮商人，在那些战争岁月，保障了部队的“军需”；在平时则通过“丝路”连接了京畿（北京、天津地区）与西北边疆的社会经济与民生生活。本书就是这段几乎被人们忘记的重要历史专著。之所以如此说，就因为“赶大营”的津帮商人，他们在那时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在清代新疆战乱之时，津帮商人通过其“赶大营”活动，为中央政府赴疆军队维护国家统一军事行动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其二，清军平定新疆分裂的战乱活动之后，为维护西北边疆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津帮商人又提供了物质保障；

其三，津帮商人在我国西北地区（尤其是在新疆地区）的商贸活动，其商品一般被称为“京货”，他们在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增进了新疆及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对国家认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凝聚力。

其四，对于近代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历史而言，津帮“赶大营”活动进一步深化了“丝绸之路”的重大历史意义。我们通过本书可以领略

^① [日]奥村荣、山本斌：《关于杨柳青商人在新疆的活动》，日本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昭和18年9月19日，油印本。

到，“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从世界史而言沟通东西方的中外文化交流、商贸活动之路，更是一条中国内地与边疆的“连心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合”之路，“大一统”国家的多民族“凝聚”之路、“向心”之路！

方兆麟先生能够举重若轻，把一个表面上民间商贸活动的一般历史现象“赶大营”，揭示出一个特定时代的重大历史文化内涵，这是需要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与造诣，更需要作者的坚忍不拔、“十年磨一剑”的科学精神。本书是写“普通人的历史”，全书行文朴实无华，“普通人”可以读懂书中历史故事，更能够轻而易举地理解“历史故事”的“背后”之“潜台词”，这在当下琳琅满目的“新书”中是不多见的。《丝路寻踪——津商赶大营》这样清新风格的历史学著作，应该是我们学术界学习的榜样！

2018年3月30日

自序

书稿终于杀青了，令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因为这本书写得确实很辛苦。

首先我想说明，这本书不是系统研究赶大营历史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以田野调查方法+文献资料研究，来考证赶大营口述历史的史料书，同时，也是一部记述近代丝绸之路路线及其兴衰的历史地理著作。我一向主张，研究历史或写历史著作应该尽量让读者看得懂，让历史走进民众，成为“大众史学”，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本书尽量避免历史教科书式的刻板写法，而以大量翔实、生动的中外历史文献资料和本人的亲自实地调查，记述了140多年前天津赶大营人挑着担子一步一步艰辛走进新疆，并在那里扎根创业的故事，以期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由于这段历史几乎没有任何档案文献正式记载，基本上是靠当事人口述流传下来的，或是散见在其他史料中的只言片语，因此考证、研究这段历史是非常困难的，除了需要走访大量的知情人，还要查阅海量的文献资料。而其中最难的部分则是赶大营的起因和从天津到新疆的万里物流路线及运输方式，既缺乏资料又众说纷纭。但在我的艰辛努力下，还是将它们逐一破解了。每每解决一个难题，感觉自己就像玩电游又过了一关，在享受过关斩将的快乐后，又将迎接更加艰巨的下一个难题。虽说这本书不是系统地研究赶

大营历史，但可以说至目前为止，它是第一本较为全面考证研究津商赶大营历史的书，也是一本探索研究近代中国丝绸之路的书。

本书从2009年我第一次赴新疆调查起到写作完成，前后花费八年时间。在这八年中，我曾七次赴新疆、七次赴内蒙古、三次赴甘肃，采访人次近百。总体看，这本书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赶大营津商进新疆创业与发展的历史；另一部分是赶大营商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将这两部分纷繁复杂的内容整合在一起，最后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令人眼花缭乱、时空交错的历史画卷。由于这段历史从宏观到微观涉及背景复杂，时空跨越较大，加之资料不足，整体驾驭起来有很大难度，因而写作中我时常陷入困惑，感到难以为继；特别是在我因白内障双眼做手术前后，视力的减退给看资料和写作带来很大困难，甚感苦恼。但一想到新疆赶大营津商后人那种殷殷期盼，想到多年来实地考察中曾给予过热情支持的众多朋友，又支撑着我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将其完成。所以在本书杀青之际掩卷遐思时，无数感慨自心底油然而生。

庆幸的是，我有做了30余年口述史料征集与整理、研究的经历和基础，对于如何提取有价值的史料，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一定的辨析、判断、核实经验，所以面对众说纷纭的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资料，还有驾驭把握能力，尚不至于一筹莫展、无从下手。从事历史研究，史料是第一位的，没有大量史料做基础，仅凭只言片语就去做判断、下结论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在个人视野之外很可能还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其实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发现新史料的基础上不断印证和修正自己以前结论的过程。所以本书中的史实，都是经过了反复核实、考证后落笔的。做史料研究，除了要看大量的史料、文献外，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否则也会闹笑话。又庆幸的是，我曾有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八年和搞过三年测绘工作的经历，这对我写这本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本书中涉及了大量有关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知识方面的内容。近代以来，有不少中外科考人士撰写了关于中国西部地理历史、商贸、民情等纪实著作，我将其中与赶大营历史相关的背景资料以

及我本人经实地考察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津商赶大营历史内容更加丰富、完整、全面，论据也更加充分扎实，同时对研究近代西北地区商贸、物流、交通等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线索。为避免本书内容庞杂、叙述繁衍，在写作中我尽量紧紧围绕与赶大营历史主题相关的内容进行记述，其他方面点到为止，而不过多展开。尽管如此，本书所包含的信息量仍是极为丰富的，可以说是满满的“干货”。

赶大营与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以前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模糊，只是朦胧认为持续了70年之久的赶大营商贸之路，不但使古丝绸之路在近代重新得到复兴，而且向东延伸到了渤海之滨，形成了中国第一条亚欧大陆桥。但是这种认识的依据何在？通过这些年到西北的实地考察与考证，终于将这个最初的“猜想”落到了实处，不但证实了赶大营人进新疆的路线自西安以后走的就是丝绸古道，而且也证明了赶大营商贸的物流路线走的就是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天山廊道路网。这些路不仅在近代对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促进西北地区与天津的交流交往以及促进天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此之前，我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丝绸之路是一条或几条显而易见、实实在在的路，就像今日的公路，甚至认为汉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就是古丝绸之路的路线。但经过研究和考察发现，这种认识有偏差，或至少说是不全面的，也可以说是对古丝绸之路狭义的理解。因为，早有史料证明，远早于张骞出使西域，东西方之间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文明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所以有人提出，东亚人中有从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以西来的人种；也有人考证，当年周穆王驾八骏赴昆仑山瑶池与王母娘娘相会，就是从葱岭以西而来的，这些都说明东西方文明的交往并不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开始，而远在此之前就已存在，只是到了汉唐时期这种交往更加密切。而将这条古商道正式命名为“丝绸之路”的，是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87年在其著作《中国》中提出的，以后在其所编《中国地图集》中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其后，西方学者赫尔曼率先接受了这个概念，并将自己1910年出版的专著命

名为《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1936年又有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将其1933年在中国勘察西北公路的笔记命名为《丝绸之路》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中国在将丝绸之路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时，提出的陆路丝绸之路定义是：以中国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和天山廊道路网，通向西亚和欧洲的陆路商道。然而在我看来，陆路丝绸之路应该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即历史上凡经中国西部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各条陆路通道，都应在丝绸之路范围之内，也包括入清以来至民国时期通往西亚的近代商路，因为这些路都以古丝绸之路为载体，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往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站在这个角度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我认为只要是能将东西方文明连接起来，促进东西方之间广泛交流、合作共赢的路，都可以纳入“一带一路”倡议范围之内。这样就打破了从狭义角度理解“一带一路”而产生的困惑，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自觉性。

本书以赶大营历史为主线，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对中国大西北进行了历史穿越。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这个穿越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否有可读性和参考价值，还得由读者来评判，并请不吝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过不少朋友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中国学术界两位很有影响的权威学者马大正先生、刘庆柱先生在认真细致审阅了拙作后，不但给予热情的指教，还专门为本书作了序。他们严谨谦逊的治学精神和热诚的鼓励，令我十分感动与敬佩，我从他们的赐教中获益匪浅！还有很多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好朋友，在我数年的实地考察中给予了非常热情的帮助，在这里一并表示由衷的、深深的感谢！正如人们常说的：所有情意都在心里，都在不言之中，其他不再赘述。谢谢了！

2018年5月1日

| 目 录 |

序一 马大正 / 001

序二 刘庆柱 / 004

自序 / 007

引言：探索赶大营历史的缘起 / 001

(一) 兴趣的产生 / 002

(二) 兴趣的升华 / 005

(三) 兴趣的“转正” / 008

一、赶大营的由来 / 017

(一) 西征与海塞防之争 / 019

(二) 军粮筹调与赶大营的初兴 / 032

(三) 赶大营起因说之辨析 / 041

二、收复新疆与津商的创业发展 / 051

(一) 新疆的收复 / 053

(二) 津商在新疆的创业与发展 / 063

1. 津商的初兴 / 063

2. 经营门类与经营方式 / 070

3. 承办协饷的辉煌 / 082

(三) 津商聚居的城市 / 093

1. 津商在乌鲁木齐 / 093

2. 津商在伊犁 / 104

3. 津商在奇台 / 118

三、丝路古道的复兴 / 143

(一) 从大盛魁到赶大营 / 145

(二) 赶大营路线的形成 / 161

1. 西出阳关 / 161

2. 八千里路云和月 / 165

3. 三千货郎遍天山 / 178

4. 坐俄台跑大营 / 187

四、赶大营的物流路线——丝路驼道 / 197

(一) 走进驼道 / 199

(二) 绥新驼道 / 212

1. 绥新驼道兴起的历史背景 / 212

2. 绥新驼道各路路线 / 217

(三) 驼运与驼队 / 241

(四) 绥新长途汽车公司与绥新公路 / 252

1. 绥新长途汽车公司产生的历史背景 / 252

2. 绥新长途汽车公司的创办与运营 / 260

3. 绥新公路的昨天与今天 / 274

五、考察见闻散记 / 287

(一) 探秘黑喇嘛城堡 / 289

(二) 梦牵明水 /	301
(三) 戈壁深处的泉 /	309
(四) 穿越无人区 /	317
(五) 弱水纪行 /	325
(六) 梦幻般的阿拉善 /	330
(七) 崛起中的新疆 /	340

结束语 /	349
-------	-----

引言：探索赶大营历史的缘起

2017年天津电视台国际部拍摄的大型纪录片《赶大营》制作完成，并计划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部纪录片共六集，时间总长达300余分钟，从各个视角展示了当年津商赶大营进新疆创业的艰辛与辉煌，将这段几乎没有任何档案文献记载、行将被淹没的历史，生动地呈现给广大观众，使人们对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之外，还有津商挑着担子徒步从渤海之滨远赴新疆赶大营的历史有了了解。我作为这部纪录片的历史顾问、专家组组长，对此深感欣慰。多年来，我和其他一些对津商赶大营历史有兴趣的同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不断深入挖掘这段不为人知的口述史料，力图真实记录并还原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全过程。2014年我们将多年征集积累的相关史料汇集成册，出版了48万字的赶大营史料汇编《丝路津商》，这部书问世后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更引起天津市委宣传部的高度重视，认为发扬津商赶大营艰苦创业精神对于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于是在2015年8月责成天津电视台国际频道以《丝路津商》一书为素材，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弘扬赶大营精神，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新的贡献。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天津电视台国际频道组织了精兵强将，奋力拼搏，不辞辛苦，跋山涉雪，数次远赴新疆、内蒙古和甘肃以及有关国家采访，最终将这部绚丽多彩的大型纪录片呈现给广大观众。我作为《丝路津商》这部书的主

编之一和《赶大营》这部大型纪录片的顾问，对于赶大营这段历史能从文字变为影视，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可以让海内外更多的观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当年津商赶大营的历史。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与赶大营这段历史结下了这个缘分，并对其一步步进行深入研究呢？这还得从30多年前一篇史料引发了我的兴趣说起。

（一）兴趣的产生

对赶大营历史产生兴趣，是我到天津市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不久的事情。1983年3月，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刊载了一篇名为《天津帮经营西大营贸易概述》史料。这篇史料写于1964年，作者王鑫岗、郭希斋、李默芴三人都是当年曾在新疆经商的亲历者，他们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较为全面、翔实地讲述了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天津商帮在新疆创业及兴衰的历史概况。文章中写道：

天津城西三十里的杨柳青镇，地近通商大埠，做小买卖为生的人甚多，尤其多幻想去外地寻求生财之道。当年这里曾流传一句谚语：“十事九不成，只有赶大营。”这些在家乡无以谋生的人，便离乡背井，踏上赶大营的道路。当时交通阻塞，去新疆路途遥远，川资浩繁。赶大营者，只得求亲友或变卖什物，凑足几两、十几两的资本，买些妇女用品，如针线、毛巾、鞋袜、小孩用品之类的小商品，担着两个小篓，徒步而行，所以当时又称这些人为“担小篓”的。他们沿途经各省城镇，边行边售，并随时进货，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跋涉才能到达新疆境内。在新疆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军队士兵。当时伊犁惠远是清朝将军的驻防地区，那里有一部分“老满营”（满族八旗兵丁），是赶大营的主要顾客。迨后去者日众，有一

去数年或十数年不归者，家属则前往探望，遂有“家眷车”，又谓之“走大路”。……“家眷车”亦兼揽携带货物的乘客，客商置货物于车上，随车步行。乘者在杨柳青西渡口或中渡口登车，送行者无不流泪惜别，盖此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当年天津人赶西大营的贸易，就是这样开始的。

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的，最早时期是随着清军统帅左宗棠、刘锦棠的军队，贩卖些士兵所需零星日用物品，军行则行，军住则住。……天津杨柳青人最早赶大营的，成分纷杂，形形色色，有小贩、手艺人、贫民、解甲士兵，甚至还有被赦免的流犯。他们都是些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以当时之交通条件和各人资力来说，虽然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疆，但都无力与内地沟通贩货，只能在当地贩卖些土产品或帝俄物品。有手艺的人则各展其能，或酿酒，或做糕点，或裁缝衣服，或做小孩玩具，有的人则到郊区种菜。……赶大营的先驱者们以其艰辛的发迹，给后人树立了榜样，越来越多的杨柳青人奔赴新疆。在光绪末年（1908），杨柳青人举目皆是，光商号即有一百多家，这时，天津人在新疆无论是从数量上、实力上或经营范围与规模上，均占绝对优势，而形成新疆商业上的一大帮派，被称为“天津帮”。

这段简短的文字，非常生动地勾勒出早期杨柳青商贩赶大营的起源与概况。这篇史料对我这个初涉文史资料工作的人来说，非常新奇，没想到早在清末时期竟然有一批天津杨柳青商人担着小篓，远涉万里之外的新疆创业经商，真是一个既了不起又鲜为人知的奇迹。过去在很多人印象中，天津人比较保守、恋家，“好出门不如赖在家”“小富即安”的观念很浓厚，不愿出外闯荡，因而这篇令人耳目一新的史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这些赶大营人当年为啥要撇家舍业、不畏艰险地远赴新疆创业？他们又是如何在新疆站住脚并打开局面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商帮的？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令我想更多地去了解它、挖掘它，并